

## 敬重和仰望

——苗勇和他的长篇传记小说《晏阳初》

□ 何开四

代投身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小说立意高远,跟随时代的节拍,的确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文学的至美与传奇人生的华丽相遇,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目前市面上有关晏阳初的作品不少,纪录片也有,但大多是研究,缺乏故事性,自然缺少吸引力和影响力。本书有别于市面上这些介绍晏阳初的书,以传记小说切入,较为新颖,不落俗套,是创新性的成果,有很强的故事性和文学性。晏阳初一生阅历丰富,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既要领导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又要四处筹集资金,往往分身乏术,仅仅是他主持的“定县试验”就涉及农村教育、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社会组织建设四大教育齐头并进的诸多内容。事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很是考验作者的叙事技巧。但作者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娴熟叙述技巧,围绕主人公成长的足迹,综合采用线状叙事结构,并综合运用倒叙、插叙和补叙等方式,对情节进行了巧妙处理,运用事件、人物和场景,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机心巧妙,引人入胜。特别是很强的故事性和诗一般的语言,让人读完小说顿感酣畅淋漓,益人心智。比如,无论是文艺教育,还是生计教育,抑或是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作者不是干巴巴地介绍,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讲述。又如,描写主人公晏阳初的家国情怀,作者是以晏阳初与底层人民特别是与背二哥交往作为重要的感情背景线,通过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从侧面来体现。再如,关于晏阳初抗日爱国的事迹,作者是通过讲述定县平民教员组织游击队、晏阳初在湖南帮助张治中搞县政改革等故事来体现的,从而达到了情节曲折、生动、感人的效果。

苗勇在写作中时时流露出来的诗性语言,也为本书增添了可读性和绚丽的文学色彩。语言,是文学的肌肤。很多传记体文学作品往往注重事实,而轻视了语言,新闻式的介绍或概念化的议论,常常会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苗勇的语言除了流畅之外,生动且极具感染力。比如,小说的开篇就极富特色:“逶迤绵延的大巴山,西接八百里秦川,东连高耸的巫岭,横贯千里。山就是这里的特色,重峦叠嶂,起伏绵延,一眼望去,群山如海,万峰如戟,太阳欲坠未坠。”这样的诗性语言,既有“大漠孤烟直”的雄壮,又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静谧与灵动,行云流水,给人遐想,且极具画面感。正如一位外国作家所说的:优美的语言不是胶,却能把思想黏合在一起。

尊重史实与完整再现历史的高度融合,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晏阳初从1890年出生到1990年在美国病逝,刚好100个年头。在他的百岁生涯中,从1918年在法

国战场开办华工识字班开始,他为中国和世界劳苦大众服务长达70余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一位出生于偏远山区的少年,从多灾多难的祖国出发,最终成为被中国和世界认可的世界伟人,其间多少艰难困苦、几多辛酸磨砺不言而喻。遗憾的是,如今我们能够找到的、看到的关于他的记录,大多只是片断摘记或者逸闻趣事,实属遗憾。

本小说采用编年体形式,生动描绘了晏阳初从出生到幼时进入私塾学习儒家典籍、少年独自外出求学,再到走出巴山远渡重洋留学美国的艰辛历程,以及扎根定县,献身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乡村改造事业的绝大部分经历以及一生的其他重要事件,对其史诗般的一生进行再现,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得到验证,并成功指导了亚非拉许多国家进行了农村改造,极具历史价值。本书系统地描写了晏阳初因于一战时期在欧洲战场教授华工识字,从而萌发了服务贫民大众的念头,回国后他立志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从开办平民学校,教授千字课为主的“除文盲”的初级阶段,到开展定县试验,推行县政改革,1950年后走出国门,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奔走在菲律宾、泰国、印度等国家进行乡村改造,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平民教育体系;教育的对象由城市平民变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教育的内容由单纯的读书识字转为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教育的方式也从单纯的学校式教育发展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最终形成了体系完备而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平民教育思想。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苗勇是一个写作态度极其认真的作家。据我了解,苗勇在写作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地获取完备的资料,大量阅读了世上有关晏阳初的书,如赛珍珠的《告语人民》、吴相湘的《晏阳初传》、晏鸿国的《晏阳初传略》等,以及大部分介绍中国平民教育和世界乡村改造运动的史料、回忆录、纪实文学等,甚至是市面上、网络上凡是有关晏阳初的资料,他差不多都会通读学习,去伪存真。写作过程中,他又实地走访了晏阳初博物馆、晏阳初纪念馆、晏阳初亲属以及定县、重庆乡村学院等,力图尽可能多地获取原始资料。2007年初稿完成后,他又广泛征求专门研究晏阳初的专家学者,10多年间数易其稿、精心打磨。书中描绘的故事大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苗勇努力做到言必有征、语无虚发,做到故事真(真人、真事、真情节)、语言真(克服假实语言),绝不因为小说情节需要而虚构篇幅。故本书在人文情怀浓烈的同时,传奇又有志史功能,显得尤为可贵。

以上三点,只是自己的陋见,不足以概括这部历时十多年40余万言的力作。我相信这部作品,以其出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希望苗勇先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事实证明,也只有传主的故乡人,才能写好传主的故乡事——包括情感在内的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让外乡人望洋兴叹。

本书正叙、倒叙、插叙并施,但大致还是依从了章回式的结构编排,细节描写和氛围营造也充分突显了文学性品质与效果。此外,读者还能够从苗勇的叙述道法中看见一种平实中见奇崛的语言修饰风景,如,“母亲的声音真好听,像缎子一般平滑柔和,丝毫没有先前的威严”。再如,“也许多年以后,土街会温馨地回忆起这样的一个细节:一位四十左右儒雅的中年人身着青色长衫,双目深邃,面带微笑,在定县街上从容不迫地走着”。

作者行文介绍晏阳初的同时,不时穿插对晏阳初的评论。从这一表征看,将这本传记归类评传文学体式也未尝不可。“可他俯下身来,满怀悲悯为全世界最底层的人们奔走,一生都在为改变底层民众这个最大公约数的生活状况而奔走,无怨无悔,穷尽一生。这不禁让人想起佛罗斯特的那首著名的诗歌《未选择的路》。”

晏阳初对清代名将、蜀中乡人杨遇春特别敬仰,在多年的时间段里将自己易名为晏遇春——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他的由家国意识、故乡情怀和英雄主义思想晶凝成的英雄情结,是多么具体和彰弛。

这是一本什么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怎样写这本书?这些问题,其实作者已在后记中道出了底牌:“原来,远在几十年前,那个从巴山深处走出来的名叫晏阳初的寒门子弟,在神州广袤的农村里,和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进行着一场多么广阔的乡村教育运动。他和他的同事,躬身前行,一心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努力奋进着。后来,他把自己的乡村改革理念,推向全世界,为地球上最苦难人们的幸福,穷尽了一生的心力。不知道者,是无知。现在,我知道了,而不告诉更多的人,就是对伟人的不敬。一个愿望就在心里悄悄滋生:总有一天,我要写一本书,写一写晏阳初,写出我心中的仰望,让许多尚不知道他名字的人,熟悉他,理解他,记住他,缅怀他。同在桑梓,后辈如我,以笔为口号,当是最好的纪念方式。”

作家蒋蓝的《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通过深度介入、还原和揭示13位当代蜀人的精神世界,“彰显了一种超越名利,尽一人之力与命运掰手腕、呵护生命的挚爱与尊严”,完全可以成为当代蜀人精神的最新注解,成为当之无愧的“为当代蜀人找魂”的代表之作。

由于《蜀人记》的写作,综合调度了散文、随笔和思想断片等非虚构笔法,冲破和超越了蒋蓝既往的写作范式,因此,给论者在言说和批评这个特殊的文本时提供了不小的难度。鉴于《蜀人记》鲜明的灵魂书写特点,观察和思考《蜀人记》在大散文写作中呈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叩问”,不失为一种评论的路径。

三种叙事的糅合与进阶毫无疑问,《蜀人记》中的13篇作品,都打下了深刻的、原初的新闻叙事基因,这当然和蒋蓝作为一家报纸首席记者的身份以及承担大量人物采访和写作的任务紧密相关,事实上,这正是他文学叙事赖以强悍展开的不竭之源。鉴于当代文学叙事的诸多经典著作或多或少都以新闻叙事为源头的事实,比如王安忆的长篇写作《长恨歌》以及《匿名》,都来源于一则很短的社会新闻。我们首先得肯定《蜀人记》的诞生与新闻叙事之间存在的这种互嵌关系,然后再找寻蒋蓝在这种互嵌关系基础上向文学叙事以及终极哲学叙事或者说思想叙事的进阶方法,或许才可以破解《蜀人记》在大散文写作上与众不同的密语。

按照新闻叙事的惯有路径,蒋蓝获得接触和采访13位当代四川奇人的机会并不复杂,也似乎并不困难:报社的新闻线索、朋友的推荐、蒋蓝自己的发现并及时报道。在严密而且工序规整的流水线引导下,一切新闻叙事的开始和结果都在掌握之中。困难恰好在于,他如何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线索里,发现人物灵魂的闪光点,并完成对采访对象的灵魂叩问。首席记者的火眼金睛?老江湖的披沙沥金?还有,熟于人情世故的棋高一着?既是,又不完全是。我想,作为作家的蒋蓝,在获得人物线索之后的精神预判,一定是超越了作为记者的蒋蓝的。

但我并不否认,蒋蓝原初的写作仍然有“完成新闻采访任务”的基础动因,当一篇新闻叙事完成了从采访本或者录音笔到报纸或者新媒体的融合报道之路,蒋蓝的任务或许就结束了。毕竟,大千世界,新闻易碎,人物易忘。然而,作为作家的蒋蓝,在完成了新闻叙事之后,对他接触到的这13位人物生发出强烈的文学叙事的冲动,由是,记者退位、作家上场,他在新闻叙事结束之后,果断地开启了他的文学叙事。其中,“奇人”的经历之奇、命运之奇、行止之奇、语言之奇以及个性之奇,尤其是思想之奇,给予了他强烈的文学叙事暗示,或者说丰厚的馈赠,帮助他完成了从新闻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进阶。

如果有意,我们大体可以在蒋蓝供职的报纸电子版里,检索到13位人物在新闻叙事中的原初面貌。和《蜀人记》以出版物的形态呈现出来的面貌相比,新闻叙事的易碎变得有质地、易忘的升华变得更加深刻。从新闻叙事到文学叙事,脱却单纯的文字加工,有蒋蓝多次的文学重返和文学对话。人物的纸上命运,也完成了由新闻纸到文学刊物的转型与跃升。13位人物的文学叙事,大多在《人民文学》《作家》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但这仍然不是他们终极的命运。蒋蓝的灵魂采访和灵魂对话,以及随着人物命运自身的尘世演进,在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之间不断激发出来的灵魂共振,需要得到更匹配、更稳妥和更高级的安置。作为思想者的蒋蓝,开始在作家蒋蓝的文学叙事上,审视哲学叙事或者说思想叙事的可能性。事实上,他在开始原初的新闻叙事时,就已经密置了自己哲学叙事的企图,并在不经意间和被采访者完成了这个企图的合谋。

在《蜀人记》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合谋”的细节,或者说,这种作者和被写作者情感互动的细节;另一方面,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或者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古典传统在发挥作用,蒋蓝对所有被采访者的“仰望”,非是采访者作为迷弟的“盲目崇拜”,而是对思想境界高企者的服帖和敬仰。以蒋蓝的思想成熟度以及其所站“知人论世”的学理高度,他并不需要虚假的逢迎作为意外回报的筹码,他灵魂交予式的服帖与敬仰,和被采访者之间所产生的思想共鸣,早就超越了记者和被新闻对象的关系,而上升为思想者交互对话的关系。

多年前,我曾经在起草四川散文年度报告里提出过一个命题:散文写作

蒋蓝散文新著《蜀人记》的价值逻辑

庞惊涛

## 续接蜀人精气神

的哲学化。蒋蓝在《蜀人记》中,在完成了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糅合后,又率先完成了哲学叙事或者说思想叙事的进阶,这就使得《蜀人记》有了成为大散文写作哲学化倾向或者说思想倾向典型文本的某种可能。在《何夕瑞:斫琴记》《赖雨:雨夜白鸽记》《何洁:青峰山记》诸篇里,都有着这种哲学化或者说思想化倾向。以上是我们解读《蜀人记》的文本逻辑。

《蜀人记》从新闻叙事向文学叙事并最终向哲学叙事的终极进阶,究竟意图何在?或者说,蒋蓝将13位人物从新闻纸向文学刊物并最终向出版物的安置,究竟要完成一个怎样的使命?

不要忘了书封上除了“当代四川奇人录”这个副书名之外的另外一个提示:纵目之光,续接蜀人精气神。我认为,这正是本书的书眼所在。如果说,三星堆出土的纵目之神,言说的是从上古到近代的蜀人精神,那么纵目之神之后,当代蜀人的精神,究竟需要到哪里去寻找?很显然,历史与文献只能是参考,续接的当代蜀人精神,只有在当代蜀人中去仔细打捞。大人物或者名人固然存在着一定的打捞价值,但小人物的尘土与烟火气息,或许更有打捞价值。蒋蓝出身市井,深谙这种打捞的逻辑。就像长期行走于田野之间的捕鱼者,他只需要打量一眼水田,就可以知道是否有鱼虾蟹龟的收获。城市化或者工业化驯服后的河滩地,只能饲养娇生惯养或者气息奄奄、毒化或者异化的观赏型水产,绝不能用生猛或者生龙活虎形容之,至于营养,则就根本谈不上。

读完《蜀人记》,我认真做了一个人物谱,将书中13位人物的名字、职业身份或者特征,尤其是其精神世界,进行了详细的梳理。陈望慧的执着、硬核以及基于让村民共同富裕的爱意;何夕瑞对斫琴的热爱、敬畏与一丝不苟;赖雨对和她一样的弱者的爱以及作为诗人的天性的孤独;冯春对长漂的执念以及基于这种执念之上的国家荣誉;高叔先作为萤火虫的养护人和守护者对大自然的爱护;李西阕作为一个新蜀人对蜀人的爱与回报;何洁作为一个佛教徒的慈悲、宽容;龙志成作为一个当代铸剑师的执着;龚氏对圆扇技艺的勤奋、精细与爱;何玉涛以一个当代孝子所诠释的善良、孝道以及爱与责任感;罗成基作为一个师者的爱与责任;陈子庄的刚毅、圆融、智慧与超脱的爱;聂正远作为红军墓守护人的爱与责任。将他们的精神与性格合并同类项之后,我惊奇地发现:爱与责任,是两个高频度出现的热词。我似乎从蒋蓝糅合了新闻叙事、文学叙事与哲学叙事的写作中,发现了他的企图,破译了他的密语:所谓纵目之光的接续,不外是爱与责任两种精神的揭橥和强化。

正如“安逸和巴适”,早就不能代表当代蜀人的精神世界一样,“乐观包容”“友善公益”也只是当代天府文化、蜀人态度的一部分。爱与责任作为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蜀人精神,正是温暖美学的生动体现。这一点,倒是与评论家敬文东在本书的序言里所表达的谋合而合:唯有有温度的讲述方式才能更好地让读者心动。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说:蒋蓝在《蜀人记》中呈现出来的温暖美学,正是他对爱与责任两种精神的揭橥和强化。

这是我们解读《蜀人记》的思想逻辑。

我觉得,现在是到了该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系统回答的时候了。当然,不可避免地,或者说,当仁不让地,我们还是需要依赖文学的方式做出回答。现在,我依赖的正是《蜀人记》作为文学样本的价值逻辑。

## 故乡情怀与英雄情结对接之书

——读苗勇长篇传记小说《晏阳初》

□ 凸凹

苗勇是一位文涉纪实文学、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多门类著作等身的蜀中作家。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其题材选择,有一个占比很重的鲜明旨径,那就是对故乡巴中持续发力、深耕细作的呈述与热爱——这已然成为他秘密公开的文学宿命。他的近五十万言长篇传记小说《晏阳初》,依然沿袭了这一脉向。具体说来,他是将循环在自己骨血中的故乡情怀转切为对一位故乡人物倾力复盘式的塑造上。不仅让自己,也让一位有大能量的人物,为故乡赋能。这个有大能量的人物,自是显示在书名上的晏阳初。

我从所知道的,仅止于巴中有个名人叫晏阳初,他是民国时期的平民教育家、贫穷乡村改造建设实践者。事实上,他哪里只是离我们较远的民国时期人物?寿龄百岁的他,活到了1990年。

这几天,我放下手头俗务,一口气读了苗勇笔下的《晏阳初》。

首先,我之前读到的晏阳初,是平面的、色彩单一的晏阳初,其呈现基本就一个范式,即,人生线等于事业线。苗勇对晏阳初的呈现就不同了,既是历史事实的陈列,更是文学艺术的建构。

全书由三条线在时间的顺流与回流中,自觉不自觉地自然穿梭、交集构成。这三条线,除了其他文章家专营的事业线,苗勇还着力垒砌了情感线和故乡线——这是此书的最大特色和价值所在,当然也是其可读性强的核心密码。

关于事业线,作者扭住“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八字理念不放,梳理、绘写了传主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到一战欧洲战场,到中国大地,到菲律宾,到世界诸国,凭一己之力,聚集同志,以民间行为方式,推动、整合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资源,在广大的落后乡村直面“愚、贫、弱、私”的农民兄弟,成功展开一系列令全世界瞩目的变革时间进程的“四育并举”实践:用文艺教育攻愚,发扬知识力;用生计教育攻穷,开发生产力;用卫生教育防病治病,培养健康力;用公民教育攻私、发扬团结力。最终实现让全世界文明的主体基底,即占全人类总量四分之三的伟大农民,迅速实现“除文盲,作新民”的宏大愿望。